

一路相伴

□ 束沛德

《文艺报》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它诞生之日起,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多少年来,在为繁荣文学跑龙套的路上,《文艺报》与我携手同行,是我情投意合的旅伴。

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之日,正好是我迈入大学门槛之际。那时尽管囊中羞涩,但还是省吃俭用,挤出一块钱订阅了一本《学习》杂志和一本《文艺报》。在大学期间,我曾写信给《文艺报》“文艺信箱”专栏,反映自己在习作中遇到的题材狭窄贫乏、语言枯燥无味的苦恼。时隔不久,就收到编辑用秀美的文字写来的两页回信,引导我更多了解、熟悉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并多读中外文学名著。

大学毕业前夕,我填写的工作志愿:一是文学编辑,二是文艺理论研究,三是党的宣传工作。《文艺报》是我心驰神往的一个去处。最后我被分配到全国文联,恰好和《文艺报》是一家人。我们同在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开会、听报告,同在22号地下室的一个食堂用餐,也在同一个党、团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样,《文艺报》一些年轻编辑很快成了我新结识的朋友。

跨进文协门槛,我从1952年冬开始为《文艺报》写稿。开头是结合我参与的工作、文学活动写一些消息报道,如《全国文联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全国文联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同时也写了《作家应当关心当前的作品》等短评。当时我所在的创作委员会秘书室担负着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定期(每季度一次)向作协主席团汇报当前创作情况的任务。我在阅读、研究中发现了新人佳作或值得探讨的创作问题,就写成评论文字送到近在咫尺的《文艺报》编辑部。得近水楼台之便,那几年我先后在《文艺报》发过评介闻捷的特写、何为的散文、张有德的短篇小说的文章。特别是1956年、1957年先后在《文艺报》发表的题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两篇文章,使我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前一篇文章引起了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达两年之久,多少活跃了当时儿童文学界学术论争的空气。后一篇文章得到评论界、儿童文学界很多朋友,包括作者柯岩在内的肯定和鼓励。当年《文艺报》副总编辑侯金镜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作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有的评论者认为,此文对儿童情调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由于这是最早评论柯岩儿童诗的一篇文章,又被评论者认为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因为它不仅被收入《中国儿童文学大事记(一)》《中国儿童文学60年》等十多种文集或评论选集;而且时隔半个多世纪,在柯岩逝世后,那份“柯岩同志生平”中仍然提到我“当时就对柯岩的儿童诗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正因为发表过这两篇多少有点影响的文章,当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后,1985年初作协书记处在研究工作分工时,由于班子成员中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时任常务书记的唐达成在会上说:“沛德50年代就在《文艺报》发了一些儿童文学评论,近些年仍然关注儿童文学,由他分工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合适。”同事们都表示赞同,这样就把我推上了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岗位。1986年至2007年,我当了20多年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为发展儿童文学略尽绵薄之力,这不能不感激《文艺报》发的两篇文章给我带来的机遇。

我不能一味讲成功和机缘,避而不谈失误和挫折。我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和遭遇,也是与《文艺报》紧密相连的。1957年整风运动开展后,在“大鸣大放”高潮中,我在《文艺报》发了一篇访问长春几位老作家的长篇报道。这篇批评文艺领导存在教条主义、宗派情绪,表达了作家心声的文章,在反右斗争中却成了我“替右派鸣锣开道”白纸黑字的证据。原本被看作患有“右倾顽症”的我,当反右狂风袭来前后,又随波逐流,在《文艺报》发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批秋耘的评论《刺向哪里》;一篇批丁玲的散文特写《记游桃花源》和《粮秣主任》。在大风大浪中的左右摇摆,正像前些年我在《我也当过“炮手”》一文中所反思的:“私心杂念不可有,看风使舵不可取,违心之事不可为,明辨是非最可贵。”每当想起自己当年也曾加入挥舞棍棒的行列,至今依然感到深深的愧疚。

十年浩劫,《文艺报》被迫停刊。待到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后不久,随着作协恢复工作,我也由河北调回中国作协。此时,曾有一次到《文艺报》工作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事情是这样的:我回到作协,冯牧找我谈工作,说是决定让我到《文艺报》阅读、研究作品,拟一些选题,组织评论文章,自己也可动手写一些文章。说实话,这是符合我的心愿的。当然,也有点忐忑不安,毕竟业务荒疏了多年,归队不久,能否胜任,不太有把握。冯牧觉察到我面露难色,当即热情地鼓励我:你50年代就为《文艺报》写文章,还是有基础的,熟悉一段情况,是不难胜任的。正当我准备到编辑部上班时,事情发生变化,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先参加一段中国作协落实政策的复查工作。待听完三次作代会,中国作协成立了创作联络部,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李季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同冯牧商量了,决定让

你到创联部工作,去《文艺报》工作的事以后再谈。没有商量余地,去《文艺报》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我是学新闻的,又爱好文学,《文艺报》似是最适合我的工作岗位。多少年来,我注意到《文艺报》造就出一批又一批能干、出色的编辑、记者、评论家,那可真是一个人出人才的地方啊!我这辈子没能去《文艺报》,至今还引以为憾哩!

没能如愿去《文艺报》,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分管儿童文学工作后,与《文艺报》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了。

1986年6月中国作协主席团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中提出:希望各文学创作、评论刊物经常选发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及有关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在这方面应起带头作用。在这之后不久,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当面向我建议:“听说《文艺报》明年要扩版为周报八版,该建议他们每月拿出一块版面出儿童文学评论专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他的倡议与我谋而合,在党组、书记处会议讨论《文艺报》改版计划时,我一再申述出这么一个专刊对推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好处,此事得到了包括《文艺报》主编谢永旺在内的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成员的一致支持。当1987年1月《文艺报》扩版为周报八版,并开始标明报纸为中国作协主办时,1月24日由冰心老人题写名称的“儿童文学评论”专版就应运而生了。在第一期上我还写了题为《窗口·桥梁·苗圃》一文,表达了我对专版的期望。从创刊至今,27年间,这个专版已出了300多期。该版出满100期之际,我曾写过一篇《十年辛苦不寻常》。诚然,在它的成长道路上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麻烦,特别是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一度萎缩,陷入困境。但《文艺报》历任总编和编辑部同仁坚韧不拔,攻坚克难,还是苦苦支撑下来了。我也曾为它的生存、发展,在一些场合不止一次地呼吁过。尽管人微言轻,也还是多少起了点作用。如今它每月两期,按时出刊,占一整版,作者也有不少新面孔,可说是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个专版是儿童文学园丁十分珍惜、勤于耕耘的一块园地。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可说是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的问世,给我为儿童文学鼓与呼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舞台。这么多年,我在专版上发表过或长或短的文章可能有三四十篇。其中有宏观扫描的,如:《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我国儿童文学扫描》《为新中国儿童文学勾勒一个轮廓》等;也有对金波、樊发稼、刘先平、曹文轩、秦文君、郑春华、黄蓓佳等作家评论。还有回忆、怀念儿童文学前辈或兄长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郭风、刘厚明等的散文。近些年我差不多已养成一个习惯:每当写出有关儿童文学的文章,总要考虑一下是否先投寄《文艺报》。发出稿子时,也总要向编辑表明:能登就登,千万不要勉强,让你们为难;如不合适,告我一声就行。有时为避免近水楼台、频频亮相之嫌,我有意识地把一些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稿子投向其他报刊了。《文艺报》的历任编辑,在交往、合作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敬业、热情、平易与细致。

我不是那么勤奋,也没写出什么有特色、有分量的文章。但《文艺报》编辑部对我的写作成果,可说是一向关注、支持的。每当我出版一本新书,总会发消息或评论。早在90年代初,就在显著位置发过彭斯远的《批评是为了发展——束沛德儿童文学研究漫议》,对我的评论见解和特色作了简洁的概括。当我的散文集《岁月风铃》、评论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出版后,《文艺报》不仅及时刊发了召开座谈会的消息,还发了多篇评论文章。评论家陈辽就先写了题为《束沛德的岁月风铃》《儿童文学园地里的守望者》的文章。散文集《龙套情缘》、评论集《守望与期待》、随笔集《红线串着爱与美》问世后,吴然、李东华、陈中天等都发过评介文章。两年前,《文艺报》还发了史伟峰写的专访《乐此不疲地鼓与呼》,记述了我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历程和感悟。朋友们热情评说,为我鼓劲、加油,激励、鞭策我在文学路上继续前行。

岁月如梭,转瞬之间,迎来了《文艺报》65周年华诞。我面前放着一本封面发黄、书页上水渍斑斑的《文艺报》(1—13期)合订本,周刊16开,每期12—16页,那是1949年5月4日至7月28日作为全国文联筹委会和一次文代会的机关报出版的。我清晰地记得,在上海上大学期间,星期天到福州路书店,无意中发现了这本刊物。这个合订本留下了《文艺报》呱呱坠地的身影。当年它并不引人注目,如今已成为稀缺的、弥足珍贵的史料。我的一个书柜和书房一角还堆满了从创刊至今的全套《文艺报》。多少年来,生活动荡,工作调动,经历了几次举家大搬迁,不少心爱的报刊杂志都先后忍痛处置了。惟独这份完整的《文艺报》,我始终爱不释手,难舍难分。

面对今日的《文艺报》,我想,这份历史悠久、传达文学界声音的报纸,同样面临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如何使之更好地顺应时代大潮、贴近文学实际、满足读者需求,努力做到坚守文学品质又富有鲜明特色,丰富精粹又生动亲切,是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作为一个老读者、老作者,我默默地、真诚地期待着、守望着。但愿它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不管怎样,我始终不渝,会让这个真挚的旅伴,陪我一起走完漫长而平凡的人生路、文学路。

文学生涯的“成人礼”

□ 欧阳友权

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和文学艺术打交道,从小爱文学,后来学文学,再后来开始教文学并研究文学,最终选择以文学为职业。当了一名高校文学老师。几十年的文学职业生涯让我体会到,无论爱文学、学文学、教文学,还是创作、评论、研究文学,只要你想与文学结缘,抑或你希望在文学上有所作为,走进《文艺报》,关注和阅读《文艺报》,都将是一件受益匪浅的事儿甚至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文学入门课,因为,在我看来,《文艺报》就是一个人文学生涯的“成人礼”。

我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文艺报》是我国文艺界特别重要的一份报纸,是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的一面窗口,也不仅在于它及时报道文艺界动向、富含文坛信息和知识,还有那些或深邃、或灵动的理论批评文章对文艺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更在于它在我的文学职业生涯中所具有的“成人礼”般的特殊意义——它引导我走进文学天地,并在这个天地里实现自己的“文学梦”,逐步得到文学界的接纳和认可。

最早关注《文艺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们这些经过农村锻炼、恢复高考后一批考进大学的莘莘学子,对读书看报十分“贪婪”,我记得阅览室那份《文艺报》是月刊,常常因“僧多粥少”难得“抢”到手,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又不得不看,我是班上文学评论小组的组长,便组织同学凑钱订了一份《文艺报》供全班同学传阅。那时的《文艺报》名为“报”实为“刊”,16开本,白色封面,五色刊名,至今回忆起来留在心头的依然是亲切和温暖。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武汉大学读研,学的是文艺学,对读书依旧痴迷,不看电视更没有网络,每天关在房子里要求自己读300页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惟有不忘《文艺报》,定期都要到中文系资料室去借阅它。那时的《文艺报》已经从月刊改为周报,是名副其实的“报”了。那个年代的文学潮起潮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文艺报》在潮头立,扮演的是信息汇聚、观念引领、思想解放、理论探新的积极作用,对我而言,它依然那么有吸引力,那么温暖。

后来我一直在大学中文系教书,教文学课。

文学教师看文艺类报刊,不单是个人爱好,也是一种职业需要,《文艺报》很快便成为我“私人订制”的第一份报纸,直到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才不用自己订阅而有了一份寄赠的《文艺报》。从此,阅读并享有《文艺报》,一直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我养成了一种“记录式阅读”的习惯,即准备一个专用笔记本,把看到的精彩文章标题、发表年月日、核心观点记录下来,便于查阅使用,后来干脆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多年下来,已经积累了好几大本。从读报、摘报、存报,过渡到给《文艺报》投稿,成为该报的作者,慢慢地,就有了一些理论书评、作品评论、文艺随笔或理论文章见诸该报端。时间久了,跟编辑混了个“脸儿熟”,碰到重要的文艺热点和理论现象,偶尔也会有编辑找我约稿,有幸成为《文艺报》“约稿作者”。记得2003年冬,在丹东参加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个有关“底层写作”的话题,一同参会的有《文艺报》理论部的同志,会上我就“人民文学观念传承”的话题作了个发言。2004年1月31日,《文艺报》理论版刊出了我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一文,随即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产生较大反响,许多人和我争鸣,引发了这一年“人民文学”问题讨论,各类报刊发表该话题论文不下几十篇。接着,《文艺报》刊发了与我商榷的文章后,编辑约我写了一篇争鸣性回应文章:《人民文学,应该重新出发——就“人民文学”问题答黄浩先生》,后来《文艺报》又刊发了我的《人民作家,重新出发》一文,以体现我对这个问题的完整思考。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文艺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巨大的影响力,也看到了该报兼容学术、鼓励争鸣的办报风格。

当然,我将《文艺报》比之为自己文学生涯的“成人礼”,还体现在它对于我职业道路的深刻影响。记得当年给学生讲授“文艺理论”课程时,让学生结合当代文坛出现的新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其中涉及到的文学创作问题如:时尚的力量,能否抵御? 底层诉求,有谁关注? 欲望泛滥,如何控制? 速食化时代,经典何在? 文学命运,谁来把

握? 传播革命会成为文学终结者吗? 等等。课后让学生写委员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题为《消费时代,文学何为》的文章,经我把批改后投给《文艺报》,很快便以较大篇幅刊出。后来总结教学改革经验,该文章作为教改成果之一,支撑我们团队申报了教学成果奖,最终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一荣誉又为我后来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产生一定影响,让我的教师生涯得到一份肯定和鼓励。

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文艺报》更是我学术之路的重要引领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把自己的学术注意力放在网络文学、新媒体创作方面,而我在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心得都是在《文艺报》上发表,陆续出版的网络文学著作、主编的理论批评丛书,也都因为在《文艺报》上被他人评论而得到文学界更多同仁的了解。2007年我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成果《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其中部分内容首先就刊发在《文艺报》上,如《高科技对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挑战》一文发表于《文艺报》2001年3月20日。2005年1月13日《文艺报》刊发了长篇报道《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记中南大学文学院欧阳友权教授》,正是基于在《文艺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我对文学研究的报道,让我有幸获得了2005年的《文艺报》“年度理论创新奖”。可以说,是《文艺报》给我的机会、平台和荣誉,让我能更执著于自己的学术道路,坚定自己的学术方向,并由此增强文学理论批评的职业自信。

我们知道,“成人礼”是中国古代对成人节点的一种人伦礼仪,男性的成人礼需对年满20岁的男子行“加冠”之礼,表示其已长大成人,被族群承认,之后可以娶妻生子。“成人礼”是一种标志,也是一次庄严的人生警示:你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用成人的坚定、执著和勤勉,让主体承担积极践行生命价值的承诺。如果说,《文艺报》的扶持和影响对我的文学职业而言有着类似“成人礼”般的意义,那么,回顾和铭记我与《文艺报》的这些点点滴滴,也将鞭策我以感恩之心励志前行,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努力实现生命价值应有的承诺。



莫言(左二)与王愿坚(左一)、彭吉象(左三)在本报召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讨论会上

金近(前排右一)正在阅看本报“儿童文学评论版”,周明(右二),缪俊杰(右三)

我与文艺报

庆祝《文艺报》创刊65周年

我所漫游和攀升的世界

□ 曹霞

在我的书柜里,放着一套装订简陋、纸质发黄发脆的《文艺报》,那是我读博士期间为了写毕业论文而陆续购置的。如今,在空闲或写论文需要查找原文出处时,我还会不时地拿起它们,翻开阅读。它们早已经不起摩挲,时光在它们身上已经覆盖了半个多世纪,太多的历史“遗留”也使得它们看上去负重累累。尤其是1957年大开放的《文艺报》,纸角有不少地方脱落了,一碰就会纷纷裂成碎屑。

这套《文艺报》源于我2006年开始构思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暨“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研究》。在那之前,我主要着力于当下文学现场,追踪的是最新和重要的作家作品。因此,虽然我读的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专业,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于“十七年”期间的历史脉络只有粗略和片段的印象。至于这里面的历史发展、政治逻辑、人际纠葛和复杂的文学文本则比较陌生。在和导师确定题目后,我在写作初期大致浏览了五六十年的《文艺报》《文艺月报》《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等。无论是从时间的完整度还是文坛地位来说,《文艺报》都堪称“十七年”文艺批评的“重镇”,它全面参与并带动了当时文坛的创作、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读完了《文艺报》,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批评文本和历史走向基本上就了然于心了。在它那里,一份刊物与一个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体现得最为充分。于是,我确定了论文的主要方向:以《文艺报》研究为主,兼及时其他重要报刊资料。

最初读《文艺报》时,我每天早上先点开国家图书馆的网站,申请需要的期刊,然后再去囤囤,来回坐车倒车就得花上3个小时。查到的资料无论手抄、复印还是录入电脑,所费功夫都不少。后来觉得这种方式实在耗时耗力,便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花了约4000余元购买了“十七年”的《文艺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记得那是2007年的盛夏,同宿舍的同学都回老家了,宿舍热得密不透风,一台小电风扇缓缓地嗡嗡着。从窗子望出去,恰好可以看到绿茵场

上矫健活跃的身影、休闲小憩的人们。然而,室内的我却远离了热闹的现实生活,“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一场场漫长的“穿越”:文艺界整风和反右、令人鼓舞振奋的“百花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思维敏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问题讨论、批评家的“两结合”阐释、“人民公社”诞生的“乌托邦”作品、“大跃进”中涌现的新民歌、经济和文化调整时期的“小阳春”……这样的场景的确让人颇为恍惚,一时有些不知身在何时何地之感。但在密集而不间断的阅读中,我逐渐从理性和逻辑上认同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些陈旧的期刊和文字里,蕴藏着新鲜、原生的“文艺场”,而非只是政治化的干瘪数字与乏味批判。

随着阅读的推进,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于我不再陌生和模糊,而变得清晰可见,亲切熟悉。那些从前遥远而陌生的文学前辈的面影也渐渐清晰起来:以政治实用主义批评为主但不忘美学初心的周扬;“党的文艺政策”的坚定阐释者邵荃麟;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又各有理想坚守的茅盾、冯雪峰、胡风;在历史与政治的罅隙间保持审美和人文主义批评的侯金镜、巴人、钱谷融;积极参与文艺运动却依然保留敏锐观察和文学经验的丁玲;适应“新中国”和重新学习写作的赵树理、老舍、曹禺、巴金、王林……历史由此而具象起来,生动起来。随着认知的拓展和阔大,我渐渐学会了以“同情的了解”去重新打量批评家们在历史场域中盘根错节的复杂纠葛与文本中大量的“春秋笔法”。

在从博二到博三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每天都保持着相同的工作模式:早起读《文艺报》,午休后读《文艺报》,晚上跑步或读读闲书。每日固定重复、单调枯燥的工作不免让人生厌,但有时也会有惊喜。比如目前普遍认为“十七年”缺乏真正的本土化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但是关于“短篇小说”的探讨早已有了。《文艺报》1957年第5号、第6号发表“短篇小说漫谈”,提出“更精练些,更尖锐些,更多样些”,刊登了魏金枝的《大组结与小组结》、端木蕻良的《“短”和“深”》、冰心的《试谈短篇

小说》等文章,它们即使放在今天,依然不失其有效性。还有大多数人都认为“十七年”文学只是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可是拨开那些政治化、时代化的语汇,依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有着较高审美标准和艺术修养的批评家在文本分析中透露出了自己的美学倾向,可以体会到作家如何游走于“政治场”与“文学场”并苦心孤诣保留写作的原生态,以及当时的中国与国外互通往来的纯粹的文学喜悦。每每读到这样的“异质”材料,我总是深感喜悦,觉得苦读颇具价值,没有辜负字字爬梳的辛劳。

在我一本本、一页页、一字字的阅读和推进中,我做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并进行了分类整理:中苏文学关系、学习《讲话》、新英雄人物、美学问题、体裁与题材、戏剧冲突讨论、文本批评与回应、作家创作谈、文艺会议、群众创作……每读完一段时期的《文艺报》,我脑海里的“十七年”便一点点生成着、延展着,关于历史的发展逻辑和知识谱系慢慢地建构起来,最后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总体印象,这为我的论文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生长点和框架,并且不断加深和强化着我对那些复杂文学文本的理解。

从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到逻辑构思和最后成文,我由此得知,在历史的沟壑与裂缝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丰富的细节、生动的图景,它们足以构建起一套不同于“大历史观”和“政治—历史观”的书写。我记得论文初稿交上去后,导师的评价是“分量足,研究高度基本具备”。我想,这里的“分量”主要就是指论文中所引征的材料充足、所涉及的事件和文本广博,而且有的材料一反刻板枯燥的历史印象,让人觉得新鲜和陌生,它们大多数都来自《文艺报》。而我所收获的不仅于此,直到现在,当我在教研岗位上工作数年后,《文艺报》依然在为我的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灵感与滋养,它不仅改变和重铸了我的学术目标与路径,也形塑着我关于历史、政治、文化的价值认知。

《文艺报》之于我,是一片旷远丰厚的绿原的世界,一个经久不息的精神启喻,一段已然开始但未终结的人生旅程,值得我深切忆念。

記
録
曹霞